

## 我们上学那会儿的住宿饮食和交通

○周志德（1955水利）

1951年夏，我从北师大附中毕业，经过全国统考，考进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8月下旬的某一天，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规定，清华在北京的新生都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馆集中，由学校派车将我们接到学校。我自己带着一个铺盖卷和一个小箱子，从西单坐三轮车去报到。到了那里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了，当时见到师大附中的一些同学，以及唐友一（土木系）和林连清（机械系），我与他们两位虽不熟悉，却因为足球而知道对方。没有料到，在大学的四年里我们成为清华足球队的队友。

### 住宿

进入学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住宿。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一男生全部安排在后体育馆住宿。要知道，全部大一男生有几百人之多。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兵在后体育馆养马，把木地板彻底破坏了。抗战胜利以后，清华复员回到北京，无钱恢复木地板，就用水泥铺砌了地面。我们进到后体育馆，看到了摆放有序的一排排的双层木床，我们几个从同一中学来的同学就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安顿下来。这时外地的新生还没到京，只有北京的百把名新生，后体育馆内还算安静。过了没几天，外地新生陆续入住，后体育馆里就变得热闹非凡了。特别是上海来的新生，他们比较活跃，又相互熟悉，在体育馆里打篮

球、拉胡琴，旁若无人。

过了几个月，我们土木系的新生被安排住进二院。那是一排排平房，听说有些房间原来是作教室之用。房间的大小不等，最小的只能住八个人（当然是双层床），最大的一间能住四五十人。房间是如何安排的已记不清楚。我被安排在十人一间的房间，同屋有北京的吴中、郝石心，上海的张受天，其他的已不记得了。虽然住的条件不好，却有工友每天给打开水，扫房间。厕所是很大的公用卫生间，只有蹲坑，没有坐便器。当时有两件关于如厕的轶闻。有几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同学，常常拎着小桶如厕。开始我们有些人不明究竟，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还保持原来的习惯，用水洗。另一位是我的足球队队友唐友一，每次解大手，他一定要到图书馆的厕所。原来他从小在家里习惯于坐便器，不习惯蹲坑，图书馆的厕所有坐便器，他就舍近求远了。但是，不出半年，他们就都习惯于新的环境了。

在这段临时性的住宿期间，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先生在大礼堂召开了大一新生全体大会，说明因为招生过多，超过了学校宿舍的容量，使新生的住宿问题一直没能很好解决，向全体新生表示歉意，并介绍了学校正在加紧建设新的学生宿舍的情况。到了大一寒假后，新的宿舍楼诚斋、立斋和强斋同时落成。大一新生悉数搬进新的宿舍，八个人一间，双层床。据

说，马约翰先生为了学生的健康曾反对八个人住一间（老的宿舍都是四人一间），囿于现实条件，谁也无从改变现状。土木系一年级的男生都住进诚斋，我与吴建铤、唐友一、郝石心、吴宗盛、吕植民等人住二楼的一间，同一层还有航空系的同学。二年级时调整了系，宿舍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水利系二年级的学生仍住在诚斋。三年级时又做了宿舍调整，水利系搬到明斋，这是老宿舍楼，四人一间，双层床，我与周泰斗、陈启美、吴宗盛同住一间，直到毕业。在大学四年，我与吴做了三年半的室友，很难得。

清华园内草木茂密，还有小河，池塘，夏秋之际，蚊虫很多。学生没有蚊帐，不胜其扰。为了消灭蚊子，在夏秋时节，校方号召并组织学生灭蚊。教给我们的方法很特别，就是将肥皂水涂抹在自己脸盆的内侧，用它到草地上去“粘”蚊子。我们常到体育馆南面的小河边去灭蚊，将脸盆顺草地表面轻轻一刮，果然有不少蚊子粘附在脸盆内面，每次都有收获。

### 膳食

大一时的食堂是由学生会管理的，伙食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每等的价格及主副食都不同。每月的伙食费从七万五千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七元五角）（乙等）到十万元（戊等）。主食有的以大米为主，有的以面食为主，其中又分为细粮多的或粗粮多的。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及饮食习惯任意选择，而且在每个月末可以更改。大食堂根据伙食的种类分别布置，八个人一桌，但人员并

不固定，自由组合。一般都是熟人尽量凑在一桌。主食不限量，副食一般是两荤两素，开饭前已放在桌上，由先到的人将菜均分为八份。为了显示公正，分菜的人总是等到拿最后一份。汤是所谓的高汤，当然不限量。食堂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站着吃饭。到了二年级，国家决定所有大学生的伙食费由国家负担，这个决定持续了三年，我在大学就有三年吃饭不要钱。这样一来，伙食标准也就只有一种了，每人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到了三年级，蒋南翔入主清华任校长，他很重视体育活动，对校运动队也很关心，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提高运动队的伙食标准，午饭和晚饭在原有的伙食标准上增加一个荤菜。这样所有运动队就集中在一个食堂就餐。我是校足球队的成员，吃了两年的运动员伙食。

食堂的伙食常年无大变化，主食更是经久不变。只有遇到特殊的节日，才会有点不同，如除夕夜有牛肉粥供应。最难忘的是1953年“七一”，食堂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特地准备了打卤面，这一下不得了了，面桶被男同学围得水泄不通，最里层的人虽已盛好了面条，却无法出来，秩序



水54同学欢聚，左起：周志德，杨启声、胡允谟、万兆惠、吴宗盛

## □ 母校纪事

一片混乱。记得当时从里面挤出来一位高大的男同学（建筑系1955级的），身上挂了不少面条，狼狈不堪。从那次之后，食堂再不提供面条了。

### 交通

清华地处北京西郊，1951年我们入学时，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更没有一条公共汽车线经过清华。唯一一条距清华较近的公共汽车路线是由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它经停北大西门，从那里有一条长约一公里的窄水泥路通向清华西门。当时清华南门外还很荒凉，没有公路通向城里。1952年以后，八大学院相继成立，由新街口豁口径八大学院、清华南门、清华西门，到颐和园的公路才开通，并有公共汽车行驶。这样清华进城的公共交通问题才有所缓解。

为了方便群众进城，学校雇用私营的宝隆车行开通收费校车，从二校门到东华门，中间经停西单新华书店门前。每天定点开行（这个校车直到1957年后才停驶）。平时并不算拥挤，但在周末和节假日乘客很多。有一次校车出了大事故。某一天下午，一辆校车从东华门出发，车内挤满了人，汽车在景山前街附近转弯时，车门突然大开，四个乘客掉了车，摔在马路边，有一位乘客当场毙命，而其他三位却无大碍。校车本来就都是旧车，质量不佳，出了大事故，当然要很好整顿一番。另一件关于校车的逸闻是小偷如何利用校车的。清华的学生有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一般是在下午5点左右开始，锻炼一个小时。当时学生浴室都在体育馆，锻炼之后很多人就在那里洗澡。有一段时

间，许多人发现在洗澡时经常丢东西，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校方。校卫队经过仔细侦察，终于发现了一个小偷。这个人经常从城里坐校车到清华作案。时间一长，他发现下午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很有利的作案时机，浴室外到处放着洗澡学生的衣物，无人看管，他就顺手牵羊，然后坐6点左右的校车回城里。有一个下午，当这个小偷带着赃物，坐进校车后，已经准备好的校卫队员不费吹灰之力，人赃俱获，他也只好束手就擒了。

当时校内的自行车不多，我们班150人还不到10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还接近于奢侈品。唐友一拥有一辆，利用率很高，他每个周末都骑车回城里的家。有时在校园里看到周培源和梁思成两位教授各骑一辆英国黑色26吋风头男车，很令人羡慕。鹤发童颜的马约翰教授则骑一辆大把自行车在校园内穿行则很让学生佩服。

校园里有几辆客运三轮车，也以二校门为集散地。校车下来的有些人，如教授夫人，有时会坐三轮车回家。有时有人在二校门等不到校车，又急于进城，也可能乘三轮车到北大西门去乘公共汽车。我在二三年级时入选北京市足球队，有时为了赶进城去赛球，也不得不乘三轮车到北大西门。有一位老三轮车工人喜欢看足球赛，经常看校足球队比赛，我坐他的车时，他常常谈起清华足球队的逸事及一些名队员，使我与他更加熟悉。

从西直门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经过清华园，在清华南门外有清华园站。在丰沙线修建之前，这条铁路利用率是很高的。每逢“五一”、“十一”，清华学生都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在一二年级时，我们曾

由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朝阳门附近的车站进城去参加游行。二年级暑假的教学实习地在官厅水库工地，我们两个班约60名学生及教师和后勤人员就是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经京张线去官厅水库的。我们班的同学有一段轶闻与这条铁路线有关。我们班的两个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一天下午，他们信步出了南校门，漫步到铁路线上，然后就沿着铁路线散步。突然间，他们发现一辆火车停在了他们身后，司机下车问

他们为什么不躲避火车。原来，火车司机在很远处已经发现了有人在铁路上走，一再鸣笛，谁知这两人居然没有听到。好在司机及时停车避免了一场事故。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司机请他们两位乘这辆火车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经过车站人员的询问，并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知道他们都是好学生，就把他们“放”了。

（节选自周志德《清华杂忆》，题目为编者所加）

## 1958潮河之冬

——写于水利系首建工地设代组55周年

○丁 照（1958水利）

一个时代镜头，一段水利系往事，一场同学情和战友情！

在人生将近80个春秋中，你要问哪一年对你印象最深，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1958年的冬天。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便是“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当时共有三大水利项目等待学生去做，密云水库、三家店水库和张坊水库。实际上，落实下来的只有密云和三家店两处。两个工程的初设虽都做了，但后来真正施工的则只有密云水库。这是一座具有多种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在北京市密云县境内的白河与潮河两条河上（在顺义汇集为一条潮白河），各建主坝一座，高水位时，便汇集成一座水库。此外还有许多副坝及其他混凝土建筑物等。这座华北最大的建设项

目，本是列入未来的五年计划，1958年提前上马，所以，时间紧迫，特别是位于首都上游，更要求万无一失，绝对安全。

当时全国是一片跃进声，在这个大背景下，学校执行的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而我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还未等完全毕业便接到通知说，立即到密云水库工地参加设计代表组工作。于是，1958年9月7日，我和另外三人，坐上一辆从市里派来的苏制嘎斯拖斗吉普车，带上铺盖卷，匆匆来到水库工地。这便是水利系在工地建立设计代表组的最初萌芽。

那是由席棚搭建的四合院式指挥部，位于库区内的一片开阔地上，旁边就是宽阔的潮河。总指挥是王宪同志，大概也就30岁，他原是通州专区的一把手，调来工地全权负责（后来是市委农村工作部书